

從周邊的視角看孫中山

〔韓國〕裴京漢

在孫中山開展反清的共和革命運動的時期，即從 1894 年左右開始到 1925 年他走完 59 歲的生命旅途，這一時期韓國在列強的侵略下掙扎在亡國的危機中，最終淪落為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另一方面，到十九世紀末，在傳統的朝貢關係框架中一直對韓國施加強大影響力的中國，在鴉片戰爭後也不可避免地面臨著列強的侵略和從農民中爆發出來的內部改革要求，同韓國一樣，這一時期中國也出現了亡國的危機，陷入了改革和革命的旋渦中。換言之，孫中山活動的時期，即在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這一時期，中國和韓國在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下都面臨亡國危機，處於同病相憐的境地。而韓國人對於中國革命或者其領導人孫中山的關心，從一開始也就與眾不同。

事實上在二十世紀一〇年代及二十年代，韓國人對孫中山極為感興趣，這可以從當時孫中山與韓國人頻繁的交流以及韓國人對其思想和活動進行的大量論述與評價中得到確證。例如，當時在韓國的報刊雜誌中關於孫中山的報導和評論文章不僅多，而且這些報導和評論文章的視角不同於同時代的其他國家或地區的文獻資料，充分展現了一種非常獨特的立場。當然，這種立場與中國人的立場有一定區別，而筆者認為正因為如此，韓國人的視角與中國人的視角相比，具備了相對更為客觀的立場。

例如，中國學者研究孫中山時，總是強調其肯定性的一面或成功的一面。這是因為他們出於對自己的歷史和英雄先輩的情感和尊敬，在進行歷史研究的過程中對於直接出現的否定性的或失敗的一面視而不見，從而導致了他們總強調成功的一面的情況。當然，這種主觀的視角不是只有中國學者們才有。將韓國史作為自己的歷史來研究的韓國學者們，也一樣常常陷入主觀的立場中。其中體現主觀立場最為典型的，就是與現實或政治聯繫密切的現代史了。例如在研究作為韓國現代史主要脈絡中的重要一環的韓國獨立運動時，經常會看到不少韓國學者就像自己參與獨立運動似的進行“研究”，這一現象在研究中國現代史的中國學者中也同樣存在。換言之，筆者認為，在對中國革命或孫中山進行研究時，在盡可能地避免這種主觀性和單面性解釋方面，韓國人的視角或許能夠發揮巨大的作用。

這種韓國人的視角，可以稱為“周邊的視角”。這一周邊的視角，正如其名，指的不是在中國國內而是在中國周邊觀察中國的視角。所謂周邊的視角，其周邊不是單純指地理位置上的周邊，而是指同樣具有殖民地乃至半殖民地經歷、也同樣有過試圖從這種狀態下擺脫出來為實現自主獨立而努力的經歷，並且不是中國對自己的、而是將中國和韓國都看作第三世界一環的，這樣來看中國的、包含了所謂“第三世界的視角”的“周邊的視角”。

不僅如此，筆者認為韓國人的“周邊的視角”包含了許多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相比更加有利於理解中國的多種觀點。從傳統時代開始，韓國就持續接受了中國文化乃至中國歷史的影響，而且中國的這一影響比其他任何周邊國家都要強大而深遠，因而韓國在理解中國方面有許多有利條件。雖然這種有利條件間或被批判為“事大主義”或者作為事大主義殘餘的慕華立場，然而對於理解中國本身來說具備有利條件確是事實。比如朝鮮時代的士大夫們能夠熟練地運用漢字作為正式記載的手段，並且用以《史記》為代表的中國史書為教科書接受了大量的歷史教育和文章訓練，而這種“對中國的熟悉”對於理解中國和接觸中國具有明顯的優勢，韓國的“周邊的視角”也是站在這種優點基礎上的。

二

從周邊也就是韓國的角度來看，孫中山究竟是個什麼人物呢？圍繞這個問題，在筆者已往的研究中可以得到確認的是，在二十世紀初，孫中山所代表的中國和中國革命（共和革命）被韓國人當作一種必須要學習的教科書式的內容來接受。對於在亡國危機中無法開展革命運動追求獨立的諸多韓國志士來說，中國革命的消息無疑是能為他們提供新發展藍圖的福音。武昌起義之後，韓國志士開始大量流亡到中國關內地區，以上海為中心建立起的韓國人社會，其背景也正是基於韓國人對學習中國革命經驗的希望和期待。

不僅如此，孫中山和中國革命對於二十世紀初的韓國人可以說是主張獨立，即主張反帝和抗日的最重要的窗口。當時韓國的報刊和雜誌不僅對革命中國即“南方中國”集中表現出了極大關注，而且通過這些也表達了自己抗日和獨立的願望。無論是1925年1月孫中山去世之前韓國輿論界散佈的孫中山死亡說，還是1925年6月孫中山去世之後在韓國國內試圖召開的孫中山追悼會，都表明了當時孫中山在韓國人心目中的友好形象，在韓國人眼中孫中山甚至已成為反帝和抗日的象徵。

進一步講，孫中山所代表的中國革命黨人已經被二十世紀初的韓國人視為必須要聯合的同伴乃至同志，而這是基於同樣遭受帝國主義列強侵略面臨亡國危機的韓國與中國同病相憐的境遇。從這一角度出發，早期流亡中國的韓國人認為支持中國革命，甚至參加革命作出犧牲都是理所應當的事情。而韓國志士支持和參加中國革命運動即辛亥革命，也是出於對革命勝利之後逐漸強盛起來的中國能夠對韓國伸出援助之手的期待。1921年10月，上海韓國臨時政府代表申圭植訪問廣東護法政府時與孫中山所進行的會談，也反映出了韓國人對中國革命成功的期待。韓國臨時政府為了能夠參加美國主導召開的華盛頓會議，力圖尋求獲得孫中山和廣東政府的支持。

當然，我們也應該看到，韓國志士對獲得中國支持的期待已經超過了相互連帶的水平，接近了依存中國或者說“事大主義”的形態。武昌起義之後在上海“謁見”孫中山的申圭植在孫中山面前高呼萬歲的情景，以及1921年訪問廣州時申圭植一行“奉呈國書”的情景，一方面反映出對中國的過分期待，另一方面也是一種對依賴中國乃至“事大主義”行動的折射。而圍繞這樣的事大主義態度展開的爭論，也引發了韓國志士之間相互的指責和分裂。

三

然而，韓國人對孫中山和中國革命的這種期待，事實上從一開始就是難以實現的。這雖然與中國革命興衰交替本身並沒有取得能夠支持韓國的成功有關，但是更關鍵的是由於，孫中山及

中國革命派人士對韓國的理解和認識本身，與韓國人期待的互惠平等存在一定的差距。孫中山和革命派人士在一定程度上帶有傳統的領土觀念，如“保我藩邦”等。在這種領土觀念的前提下，孫中山所說的“民族主義”很難再成為為中國周邊弱小國家代言的福音。以周邊的視角來看，孫中山的“民族主義”無法從根本上克服以中國為中心的民族主義。

孫中山對韓國以及周邊弱小國家的這種態度，在其晚年訪問日本時進行的著名的“大亞洲主義”演講中明確體現出來。主張亞洲弱小民族之間大聯合的“大亞洲主義”演講，表面上以民族間的互惠平等為目標，但著眼於以中國和日本為中心的亞洲聯合主張即“中日領導論”這一前提，“大亞洲主義”最終很難被作為追求互惠平等的號召。直到晚年，孫中山都一直在期待能夠獲得日本的支持，而由於這種期待，他不僅認可了作為侵略者的日本在亞洲的領導地位，而且從中國中心主義角度出發，試圖維持中國在亞洲的主導權地位。從認可中國與日本主導權的立場來看，孫中山在“大亞洲主義”演講中，從一開始就不會提及日本支配韓國的不當性。儘管如此，當時很多韓國人還是對孫中山在演講中能夠提及韓國問題抱有非常大的期望，而韓國人對孫中山以及中國革命的這種期待最終慘遭破滅，在最後的這一公開演講中，孫中山不僅對韓國問題隻字未提，反而站在了全面認可日本在亞洲領導權的立場上。

孫中山對韓國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局限性，對於這一點，一部分近代韓國人也有相當清楚的認識。比如近代韓國最著名的輿論家、歷史學家、獨立運動的核心領導人朴殷植，在流亡中國之後就曾經尖銳地批判過韓國人“事大主義”的立場，對於包括孫中山在內的中國革命派，也不像其他韓國志士一樣一味的期待，而是堅持了“批判性支持”的立場。在“大亞洲主義”演講完全擊碎韓國人的期待之後，稱得上近代最著名的中國專門評論家的安在鴻等一部分韓國輿論人士，也曾經尖銳地批判過以中國和日本為中心的亞洲大聯合，稱其從一開始就是無法實現的。

總之，二十世紀初以周邊的視角來看待孫中山的韓國人，認為孫中山既是反帝的同志、追求獨立的同伴，同時鑒於強調中國享有主導權並希冀將韓國代表的周邊小國囊括在其影響力之下的中國中心主義立場，中國也是韓國需要警惕的對象。筆者認為，對孫中山的這種理解和評價，在以克服中國中心主義和“事大主義”為目標的同時，也是對尋求真正意義上以互惠平等為基礎的新的中韓關係的一種摸索以及探詢道路出發點。

（作者係韓國新羅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史學科教授）